

江西文史 资料选辑

2

198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总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六月

目 录

回忆长征路上的三十位女红军·····	危秀英 (1)
一次不寻常的战斗旅程·····	钟 平 (14)
难忘的一次护送·····	黄炳光 (28)
陈毅下山侧记·····	赖志刚 (35)
回忆在董老身边二三事·····	赖荣光 (42)
一次难忘的参观学习·····	宣金堂 (46)
一个民族工商业者所走的道路·····	沈翰卿 (53)
南昌李祥泰的发家史·····	李善元 (65)
婺绿史话·····	刘隆祥 (75)
苏区时期的中央剧团·····	汤家庆 (81)
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各县 苏维埃政权概况·····	邵天柱 (87)
略谈“富田事变”的经过·····	汪安国 (102)
关于富田事变及江西苏区肃反问题·····	文 宏 (109)
红三军反 A B 团的见闻·····	梅成章 (120)

瑞金苏区时期反“社会民主党”

的一些情况……………顾玉平(124)

袁文才、王佐被杀事件的点滴情况……………吴生开(127)

A B团与改组派在江西活动的见闻……………陈贻琛(130)

统治江西十年的熊式辉……………姚甘霖(142)

熊式辉向蒋介石推荐杨永泰内幕……………陈鑫(156)

白崇禧枪毙赖世璜内幕……………龚师曾、姚甘霖、陈鑫(159)

旧南昌市政工役沿革……………傅朝梧(165)

回忆长征路上的三十位女红军

危秀英

1934年10月，党中央决定战略转移撤离中央苏区，率领红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

从江西瑞金出发，我们红军第一方面军八万人当中，有30位女战士。她们是：蔡畅、邓颖超、李坚真、贺子珍、康克清、刘群先、刘英、钱希均、周越华、李伯钊、丘益涵、金维映、吴仲廉、甘世英、危拱之、陈慧清、刘彩香、谢飞、曾玉、廖似光、李建华、肖月华、王泉媛、钟月林、吴富莲、邓六金、李桂英、谢小梅、杨厚珍和我。当时我在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当政治战士。

长征路上，我们女战士不止一次又一次经历了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为革命事业甘心作出最大的牺牲。征途中口渴了，饥饿了，经常紧勒裤带，舔舔嘴唇，又打起精神，昂首挺胸走在队伍行列。旧社会封建礼教摧残妇女，杨厚珍同志幼年就没有幸免缠脚的痛苦，然而她迈着两只“解放脚”，和战友们一道，走过万水千山，备尝艰险。在崎岖的征途上，我们滚爬跌打，相信自己经得起长途跋涉的考验，跌倒了，受伤了，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又继续前进，终于随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抗日前线。

到达陕北以后，这些同志有的后来在革命战争中献出了生命，有的已病逝，也有人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目前健在的都是六十开外，或者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了。但她们中大多数同志仍在各自的岗位，为新长征贡献力量。回忆当年往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政治战士的职责

那时候，连里的女同志除个别身体不好和怀孕的以外，都要担任工作，叫政治战士。政治战士的任务主要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民工的思想工作。每个政治战士要管三、四副担架，抬担架的民工都是临时雇来的，一块银元一天，他们对革命的认识有深有浅。行军时，政治战士要同民工走在一起，鼓励他们跟上队伍，有时甚至要顶替他们抬担架；宿营时，又要照顾民工的生活，让他们吃饱睡好。有一次，敌人追来了，抬陈慧清同志的民工走散了三个，剩下的那个说已经没力气了。我连忙把自己的半袋子干粮给他吃，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对他说，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是为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劳苦大众而战斗的。你帮助抬在战斗中负伤的战士，这也是参加革命工作，是很光荣的。我和这位民工一起抬着陈慧清，翻过两座山头，直到脱离险境。陈慧清是因刚生孩子不几天，实在不能行走才坐担架的。象这样，半路上接过民工的担架是经常的。刘彩香、吴富莲、王泉媛、邓六金、李桂英等，都帮着民工抬过伤病员。

我们这些政治战士，有时还要留在队伍后面做收容工作，帮助体弱因病因伤而掉在后面的同志背东西，鼓励他们赶上队伍。那怕敌人的子弹就在头顶上呼呼地掠过，我们背着许多东西，要跑步，要爬山，还要招呼战友跟上来，口喊干了，累得简直想在原地停一分钟都是好的。但时间一长，也就有经验：爬山时闭住嘴唇，咬紧牙关，用鼻子透气，自然也能坚持下去。有一次我在路旁遇着一位病号战友，他独个儿扶着枪坐在地上，因发高烧没有水喝，嘴唇烫焦了。我们当时并不认识。我先打开水壶，递水给他喝，然后把 he 身边的行装全背在我肩上，使劲把他背起就走。他见我身上挂满了东西，还要背人，带着感激的心情，郑重地对我说：“你走吧，我不能拖累你！”我硬背着他爬过两座山，回头看看敌人已经赶到我们走过的第一座山头，因为行军有伪装，我们还没被敌人发现。

我问清楚了他的队伍所在地，护送他回到自己的队伍。

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1957年我从广东到北京开会，那位同志也因公从四川来首都。恰巧有一天我们在李富春同志家里重见面。是他先认出了我，向李富春、蔡畅大姐打听我是谁？然后满怀激动的心情对我说：“危秀英同志，是你救过我的命！”蔡畅大姐从旁介绍：“他就是廖志高同志”。我们彼此回忆起二十多年前的桩桩往事，大家都发出无限的感慨。

患难与共济前进

战友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沿途互相照顾，患难与共，是我们战胜困难，避免掉队的重要原因。记得进入云贵高原的一座大山后，邓六金同志病得不能吃东西，路也走不动。我向连长要求留下来，护理她跟在队伍后面走。我替她背着东西，找水喝，还特地削了一根棍子当手杖，让她拄着走。晚上宿营了，我打开随身带的半条毛毯，紧挨邓六金睡在一起。

提起这条厚厚的毛毯，还是在中央苏区时，蔡大姐送给我的礼物。那是1934年的夏天，蔡大姐派人通知我去瑞金中央党校学习。晚上，蔡大姐拿出自己的一条黑格子厚毛毯，让我拉住另一头对折起来，用剪刀从中间剪开，将一半递给我，说这一半给你。我知道这是蔡大姐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买的，我怎么能收下呢？大姐不许我推辞，她说：“拿着，今后不管怎样困难，都不要丢了。”我回房睡下后，蔡大姐又在煤油灯下给我缝挎包，拿出毛巾，茶杯和一双筷子。担心路上筷子容易掉，还特意找来一把铁勺子。一直忙到深夜，真是把什么小事都替我想到了。从此，这半条毛毯我就总带在身边。那天晚上我和邓六金睡在一起，蔡大姐关心、爱护同志的情景，又浮现在我脑际，我为能护理自己的战友感到高兴。我明白：大家患难与共，定能战胜眼前的一切困难。心里热呼呼的，劲头也更大。

想当年，不晓得哪里来的那么一股劲，心里想的只是：不能向

困难低头。战场上，我们的同志一个也不能让敌人打伤，被敌人打死。然而敌人前堵后追，左右包围，空中轰炸，红军经常和五个方面的敌军作战，一路上牺牲的同志毕竟很多。干部连指导员李坚真大姐的警卫员牺牲在路上，我们冒着敌人的子弹，迂回到烈士身旁，含着眼泪，用刺刀挖了点土，放在他胸前，拿毛巾盖在他脸上。在当时那炮火连天的特殊环境下，我们对死难的同志就只能做到这一点，表示我们的深切哀悼。还有许多死难的同志，竟连撒把土都来不及的呀！

1935年1月4日，红军打进遵义城。钟月林同志生病，躺在床上话也不说。我心里明白，哪里是什么病。这是几天没吃饭，肚子饿的病啊！只听得遵义街上有小贩叫卖“芝麻糖”的。那是一种用玉米制的糕点，上面沾满芝麻，那口味多吸引人啦。大家都饿得紧，但是红军觉悟高，纪律严明，宁肯饿得肚子咕咕叫，谁也不想白吃群众的东西。钟月林有气无力地问我，身上还有没有钱？钱，这时谁的口袋里都是空的，纵使有一点也很少。我看出她是想买点玉米糕填补肚中的饥饿，故意安慰她说，我还有点钱，买块玉米糕给你尝尝。我设法向石坚同志借到几角钱，买回几块玉米糕。钟月林吃下玉米糕，果然病好了。这年11月，我们到达陕北瓦窑堡，石坚同志见着我还提到借钱的事，我说：“那几角钱救了我们同志的命，该重利归还你啊！”

红军刚进遵义城，我们得到消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婆要带枪逃跑。我们急忙冲进她的住屋，不料她从屋里的地道逃跑了，地道口还来不及盖。我没有留心脚下，突然跌进地道，顿时昏迷不省人事。几个同我追击的男战友，为了抓紧时机追击逃敌，来不及顾我。直到他们打扫战场，特地来地道口寻找。他们说：是活，要把她救起；是死，要把她拉出。一个同志下到地道，摸摸我胸口还在呼吸，于是小心翼翼地把我吊上来。

天天行军走路，脚一定要保护好，烫脚比吃饭还要紧。征途中，我把缴获的一个铜盆子一直带在身边，宁肯多背几斤也舍不得

丢掉它。一到宿营地，我就用它端水，拣些柴草烧热水烫烫脚。有个男同志叫胡家兵，你烧热了水叫他洗洗脚都不愿。过草地时，脚后跟烂得化脓，痛得拄着棍子在后面慢慢走。后来进入草地的第三天，我又遇到他。看他那副狼狈象，先是责怪他“自作自受”，毕竟内心里还是同情他。他已经断粮了，又烂脚，要我分点粮给他。我只剩下一点点青稞麦，因为过草地前我在外筹粮，后来回部队，林伯渠同志发现漏发了我的粮，他把自己那份给了我，当时我只要了两斤多。一路上我不敢多吃，肚子实在饿极了，才倒出一点放在嘴里嚼嚼。那时候的粮食可宝贵呀，但我还是把这点干粮给了胡家兵。

是的，同志间就是这样互相体贴，互相照顾的。我在四川北部一带，因为沿途吃的尽是野菜、树根、树叶，胃痛得紧，又亏得邓六金同志小心照顾我。征途上，战友们比亲姐妹、亲兄弟还要亲，大家也就大大地避免了掉队。

舍死忘生救战友

领导上为了照顾贺子珍同志衰弱的身体，没有让她当政治战士，可是她处处找工作做。队伍一到宿营地，她就给民工端菜送饭，打热水烫脚。民工休息了，她就和战友们轮流值班，看护民工和伤员。有一天下午，日影已经西斜，部队来到贵州盘县境地，这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山地，大家正卸下行军的伪装，准备宿营。突然一队敌机飞来，机上发现下面有红军，轮番来去扫射、轰炸。我们干部连原有“三多”：担架多，马多，人多。敌机连续扔下上百个炸弹，眼前若要转移到安全地带已经来不及了，情况万分危急。师政治委员钟赤兵同志，打遵义腿上曾负伤，现在还躺在担架上不能动，警卫员就在他担架旁被炸死。这位警卫员是兴国人，我们彼此认识，现在看到他的牺牲，心里多么难过啊！我急喊同志们原地卧倒，喊声在硝烟中还没有停止，已经隐蔽在沟边的贺子珍同志，发

现那副担架上的战友还暴露在路上，立即纵身跃起，冲过去帮助钟赤兵转移到隐蔽处。就在这一刹那，一颗炸弹在离她不远处爆炸了。为了救护战友，贺子珍毫不迟疑地扑在躺在担架上那位负过伤的战友身上，十多块炸弹碎片落在她头顶和背部，然而保全了战友没有再次负伤。殷红的鲜血透过了她的军服，流在地上，大量的出血使她几天几夜昏迷不醒。当时并没有麻醉药，几个同志狠了狠心，按住她，用铁子把弹片一块一块挟出来。当她在医生抢救下苏醒过来时，第一件事是，用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询问那位躺在担架上的伤员是否再度负伤？然后又嘱咐大家不要把她受伤的消息告诉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听说贺子珍为了抢救战友负伤了，把自己的担架和警卫员给了她。贺子珍对守护在身边的医生、护士和战友说，不要因为我影响大家行军前进，然而连里的同志坚决轮流抬着她往前走。爬山时，在担架上不去的地方，就背着她走。贺子珍完全知道，在这个极其艰难的里程，战友们是以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克服多么大的困难，才把她带着往前走啊！在那些日子里，这个有泪不轻易掉的女红军，常常被感动得流下热泪。伤势刚刚好了一点，就再也不肯让战友抬了，她坚持用自己的双脚，走过那段艰巨的征程。

军民团结鱼水情

在遵义，我们政治战士分头开展群众工作。我白天在一家火柴厂做群众工作，晚上就回营地，和李坚真、吴富莲、刘彩香、邓六金等一起睡在地铺上。那时，刘彩香正是新婚期间，她担心怀孕将来行军不便，坚持与我们睡在一起。群众大会上，我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讲解红军北上抗日、解放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张，工人群众听了很高兴。经过一段时间工作，群众提高了觉悟，军民关系密切。火柴厂有二十多个男女青年报名，自愿参加红军。经上级批准，有的补充到担架队。我先后在遵义发动了二百多个青年参

加红军。部队决定离开遵义前，上级要我把几百个重伤员留下。我设法把他们寄在单门独户、缺儿少女的穷苦人家，并且留下一些钱粮和布料。群众表示欢迎，保证安全隐蔽这些革命种子。

红军撤出遵义，渡过赤水，有意给蒋介石造成打贵阳的假象。可是逼近贵阳城只几十里，红军又回师东进，第二次打进遵义。这一仗消灭了几万敌人，捉到很多俘虏。

大批俘虏需要安置、遣散，这任务又落在我们政治战士身上。

有一天，我照常带着医师和护士，先给有伤的俘虏治伤，有病的俘虏治病；再把挑来的两担银元，给每个要求回家的俘虏发二十块银元作路费。俘虏个个欢天喜地，口口声声感谢红军大恩。我们刚发完银元，一位熟识的老大爷急匆匆走近我身旁。老大爷六十开外，花白胡子，住在县城，生活十分穷苦。红军了解他没饭吃，前几天晚上，我挑了一担大米，亲自送到老大爷家，他和老伴感激万分。现在，花白胡子老人急忙贴近我的耳朵，轻声说：“敌人进城了，你们红军大部队已经出发，我带你去找部队。”鱼儿离不开水，人民军队离不开群众。为了顾全老大爷今后能安全在白区，我急忙叫同志们脱下一身军装，请老大爷化装成红军，担着担子，领我们出城跑了二十多里路，终于帮助我们赶上了部队。临别时，我捧着发遣散费剩下的银元和自己的干粮，送给老大爷，向他挥手告别。

后来才知道，原来通知我们撤离的通讯员，半路上被敌人杀害了。我们若再耽误时间，就有出不了遵义城的危险。是老大爷得到消息，及时告诉我们。所以，没有群众就没有我们的生命。

赢得时间就是胜利

一天，领导上要我打前站，跟随陈赓同志的队伍走在大部队前头，向金沙江进发。我们赶到江边，发现没有渡船，陈赓同志设法找到一只小船。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过了

江，陈赓同志看见我，马上招呼说：“矮子，上船。”我也跟大家一样，在船上用刺刀当桨，帮着划。我是第五批过江的。

河对岸有个石洞，指挥部就设在里边，赶紧装好电台。毛主席命令后面的队伍火速赶到渡口过江，路上拉屎拉尿也不能停。整个一方面军，接连十多天才全部过完。过江后都隐蔽在山沟里待命。从这里到大渡河还有240里路，为了赶在追敌到达前占领安顺场，抢先渡过天险大渡河，赢得时间就是胜利，指挥部命令部队一天半赶到泸定桥。命令下达的当晚，部队就出发了。一路马不停蹄，人不歇脚，日夜兼程，边走边吃，边走边睡。急行军中，男同志解大小便倒不难，一个女同志，而且只有我一个女的夹在男同志队伍里，要大小便可真不方便。怎么办呢？我赶紧跑在队伍前头，远远把队伍抛在后边，趁机解了小便。随后赶上来的同志告诉我说：“你这一解小便，就走出三十里了。”这话并不夸张，恰好说明这次高速度急行军的实况。

这次急行军中，我带的水让战友们喝光了，嘴唇干得发裂。晚上天又漆黑，发现路边小坑里有水，管它清还浊，连忙喝了三、四杯，又灌满一水壶。第二天，一个战友向我讨水，喝下了一杯，再喝第二杯时，他问我：“怎么有股粪便味？”我不相信，接过杯一看，水是淡黄的，底下果然有牛屎。这下才明白：原来晚上看不到水里有牛屎。然而为了解渴，这么点不干净的水也是难得到的。我劝那位同志说：“我们江西有句土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水你就将就喝下去，前面还要打仗呀！”他闭着眼睛，把杯里的水一口喝下去，我们一同继续赶路。

红军的铁纪律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过了大渡河就要筹备爬雪山的干粮。有一天，朱德总司令带着我和邓六金、刘彩香等八个男女同志，去向当地藏胞买粮食。一路上还特意教大家认野菜，拔野菜作

辅助口粮。这时，藏胞大都割完了青稞麦，但我们还发现一块青稞，长得稀稀落落的没人收。经过打听，原来是因为麦穗结实太少，不打算割了。朱总司令严肃认真地对我们说，即使群众不打算收的，我们也不能违犯红军铁的纪律。他要我们把20块银元送到这麦地的主人、一个藏族老大爷家里。我们煮了一些割下的青稞，高高兴兴吃着。忽然总司令望望我，笑瞇瞇地说：“矮子，你成了大花脸啦！”我抬头仰望总司令，他那慈祥的脸上，也沾上烤焦的青稞，可他自己还不知道。大家彼此相望，都乐哈哈地说：我们八、九个人都象“大花脸”啦！

红军来到人迹罕至的雪山地带，贪生怕死的几十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却龟缩不见了。眼前是：前后、左右、空中无敌人，一路又有群众支援，好不开怀欢畅。前面最大的一座雪山是夹金山，据当地老百姓说，上面是万年积雪，本地人都过不去。我们的战士说：

“那么凶狠的敌人都不怕，还怕雪山吗？我们一定要翻过去。”为了革命，多少刀山火海我们不也闯过来了吗？那是刚走出中央苏区边境，在信丰县的新田、古陂之间一座山头，我们围坐在一起开会。一架敌机飞来，就在我们头顶疯狂吼叫、盘旋。刹那间，一颗炸弹从天而降，恰好落在我们围坐的空地中间，离身边不到一米。炸弹没有爆炸，溅起的泥土却搞得我们满身，钟光殿同志的两腿被泥土埋没了，董必武同志在用毛巾擦眼睛，头上脸部沾满了泥土，他边擦边风趣地说：“马克思保佑我们，因为消灭敌人的任务还未完成，炸弹落地才不开花啦！”说完，大家对敌机报以轻蔑的微笑，又聚精会神地继续开会。现在，我们进入夹金山，浓雾弥漫，大风凛冽，空气稀薄，还下雪降冰雹，红军多数人仅有两件单衣。坚强的战士，铁打的身躯，个个屏住气，忍着苦，一定要把雪山踩在脚底下。快到山顶，大家记住首长的叮嘱：不说话，不唱歌，不随便站住，后面的同志要踩着前面同志的脚印走。但是，有的同志体力实在坚持不了，只站了一下就倒在地，再也起不来了。

翻过雪山，我们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党中央

在毛儿盖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和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四人奉命留在沙窝，收容红一方面军掉在后面的伤病员，任务要求等整个部队过完了才能撤。这里是藏民聚居的地方，当时群众听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都躲在山里，找不到老百姓，我只遇到一位看家的老大爷和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彼此语言不通，我说了半天，老大爷都没听懂意思。幸好那个男孩略懂汉语，就做了临时翻译。老大爷听到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再上下仔细打量我们，果然不象国民党反动军队，才放心要那个男孩把外出的群众都叫回来。一会儿，许多群众赶着大批羊群回来了，见面时向我们鼓掌欢迎。老大爷领我进屋去。藏胞的房子是牦牛粪砌的，他们习惯住楼上。老大爷邀我上楼，拿出一块牛肉和一些土豆，拨开火灰放进去烧熟，请我们吃。又从床下拖出一口缸，倒牛奶给我喝。虽然我已经很久没吃到粮食，但是红军纪律要严格遵守，宁肯肚子饿，也不能随便吃群众的东西，违犯军纪。老大爷很着急，看样子有些生气，那个男孩在旁翻译：“不吃就是瞧不起我们藏民。”我听了更为难，于是急中生智，我向藏胞老大爷婉言道谢，连声说今天肚子痛，实在吃不下东西，愉快地离开了藏家。

初到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我们就是靠吃野菜充饥。在沙窝做接待工作七天多，刘彩香、邓六金和廖似光三人每天负责采野菜，我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那天晚上，我从藏胞家里回宿地，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三人和哨兵、通讯员全睡了。桌上还留给我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我端碗喝了一口，连忙吐出来，汤无油无盐，还顶苦的。我放下碗，也想倒在地铺上睡下，看看刘彩香占了我睡的位置，我用脚拨了一下刘彩香，让他睡过去一点。可她一动也不动。我发觉不对头，忙将她扳起来，灌水给她喝，灌了四、五口，她才睁开眼；又灌下几口，慢慢“唉”了一声，有气无力地说话：“我们吃了蘑菇，都中毒了！”我急将各人的水壶集中，到河沟里灌满水，回来再把廖似光、邓六金灌醒；又赶紧灌醒其他中毒的同志。住在同院的红四方面军一个团长和政委，还有参

谋人员，也因吃蘑菇中毒，我们都一一将他们救活过来。原来我们在这里早已断粮，几天都靠吃野菜充饥。这天，是她们吃了采回来的野蘑菇，全部不幸中毒。

枪口对外不打自己人

有一次，红四方面军的人把我围住，有个人还气势汹汹拿枪对着我。我开始讲话：“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你怎么能杀自己的同志呢！”他不听，还在破口大骂：“谁是你的同志，你们是逃跑主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说来有一段原因：

那是1935年6月，我调在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民运部，被总供给部借去筹集准备过草地的军粮。出发前，林伯渠同志交代我们，只要能买到粮食，老百姓要多少钱不还价。第一天我和李伯钊就买到很多粮食。第二天，林伯渠同志写个条子给我，找干部团陈赓团长派部队给我们。因为一路上有敌人，筹到的粮食要部队保护。我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走了几十里才会见陈赓同志。可是出乎我意外，陈赓竟不谈派部队的事，只笑笑说：“今天晚了搞不到粮食。”接着划一块地盘指给我看，口里说：“你们就在这块地方休息，莫走动，晚上十点钟我会来叫你。”果然他按时来了，叫醒我，说：“我指一条路，你顺着这方向走，可以见到林伯渠同志的，他会告诉你情况。”天蒙蒙亮，我遇到林伯渠同志，气冲冲地对他说：“陈赓不派军队，影响整个一方面军筹粮，你要撤他的职，枪毙他！”林伯渠同志向我解释：陈赓不派部队有原因，我们已经得到情报，张国焘要分裂党中央，他欺骗、蒙蔽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肯北上，要南逃另立中央。这是军事秘密，他不能对你讲。我恍然大悟。接着林伯渠还交代我再往前面走，说前面有四方面军的一个连，反对张国焘的作法，要跟随毛主席北上抗日，命令我把这个连带回来。

我带着这一连人往北走，天已大亮。四方面军的同志就站满路

两旁，因为当时一、四方面军的军服颜色不同，一看就分辨得出。我听到有人指着我叫喊：“她是一方面军的。”我知道自己走不脱了，急忙向带来的这连人使眼色，叫他们快走。于是他们很快从我身后穿过，奔向红一方面军去。红四方面军一些上当受骗的同志，所以在叫骂，在围攻我。我气得按住腰上的枪，跟他们讲道理：

“枪口要对外，不能自己打自己的战友！”正在危急时刻，军委周副主席走过来了，他连声问：“怎么，怎么？”有个警卫人员悄悄拉拉我的衣角，往旁边努努嘴，轻声说：“走”！我领会了意思，掉头就走开。因为当时周副主席在场，那些人也不敢怎么样。

我回到驻地，林伯渠同志放了心，高兴的说回来了就好啦！后来到1942年2月，我在延安中央党校会见陈赓同志，我主动向他检讨，当时错怪了他。陈赓同志乐呵呵地叫着我的外号，亲切地说：

“矮子，我晓得你当时恼了火，会骂我的。可中央没有叫传达，我要遵守军纪呀！”

找到了自己的同志

党的政策一旦深入人心，就会变成无穷的力量。那是走出草地，打开腊子口以后，我们在陕北吴起镇开展群众工作，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尊重当地回族老乡的风俗习惯，通讯员、炊事员统统跟去做群众工作。我们不开伙，把钱粮交给回民老乡，一家分两、三个战士，在他家搭饭。用老乡的碗筷，他们吃什么，我们就跟着吃什么。这样与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后来巩固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每次大会上，我们都大讲党的政策和主张，讲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抗日的。有一次，有个当地的县委书记也在群众里听讲。散会后，他带来三、四个人找到我们说：“我也是共产党员。”另外几个人介绍说：“他就是我们的县委书记。”在他们的谈话里，我开始了解陕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一些情况。原来这个根据地的

创始人之一刘志丹同志，因受打击迫害，这时还关在根据地的班房里，他们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我们万分高兴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已经胜利到达日夜盼望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了。

我马上向我的上级、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民运部长刘晓同志汇报。后来毛泽东主席了解这个情况，派人赶到瓦窑堡，要求陕北的党组织把刘志丹同志放出来，高岗也是这次被释放的。以后，党中央着手巩固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我们三十位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女红军，都分别奔向了抗日战争的前线。